

带露的朝花

吴梅英《小村庄》读札

□高上兴

温暖的故乡龙井
《小村庄》自序

□吴梅英

西湖龙井吗？

当然不是，而是我的家乡龙井村。

这样对答的时候，我肯定已经走出龙泉，模糊了我的龙井表征。龙泉人眼里，我们的特征十分明显。这个特征，也不独属于龙井，它属于龙井所在的整个乡镇——龙南乡。

龙南乡位于浙江省龙泉市东南边陲，紧邻景宁和庆元两个县。其间有江浙第一高峰黄茅尖。这个乡镇的独特之处，在于它有自己的方言。龙泉其他乡镇方言跟城区方言大致相同，龙泉人称之为龙泉话。只有龙南人说龙南话。这龙南话与龙泉话的区别，就如黄茅尖与其他山包的区别，江河与湖泊的区别。这样一种区别，上世纪末曾让一些初入县城求学的龙南少年自卑，他们飞快学习着龙泉话，渴望掩藏自己的龙南口音。更多的少年，执拗地同自己的龙南同乡大声说着龙南话，在龙南话与龙泉话的自如切换中野蛮生长。

独特的地域和口音铸就了他们的性格。或者说，是菇乡特性成就了他们的坚强和果敢。“枫树落叶，夫妻分别。枫树抽芽，丈夫回家。”曾经，人们这样描述香菇之乡龙南。菇民们的菇寮远在江西、安徽等地。整个龙南乡，男人们过着候鸟一样的生活。

龙井村在龙南最南端。继续往南走，可到达景宁鸬鹚乡。村如其名，整个龙井如在井底。井壁是深沉的大山。一条溪流穿村而过。房屋香菇一样，一个紧挨一个，沿溪生长。全村一百多户人家，一圈跑过来用不了几分钟。

男人们在他乡究竟怎样生活？童年的我一无所知。我只是村庄四季的守望者：春天里欢快奔跑着家家接饼；夏天趴在八仙桌旁，看山上回来的祖父和父亲沉着脸用餐；秋天目送燕子和男人一同离去，村庄一日日空荡下来；冬天跟随祖母和母亲，紧锁房门抵御漫长冬夜的寒冷和恐惧。

时间是流淌着的。我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，记忆的模糊影像里，还留存着龙井戏班子的影子。龙井村有一座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（公元1896年）的五显庙，菇神戏的源头却要追溯到更远。龙井张家家谱上有记载的戏班师爷，生于道光年间。庙宇只是形式，香菇与生计才是内容。神佛一直与龙井同在，我很小跟随祖母提着供品出入五显庙。我并不知道自己拜的是神

还是佛，我从不思考，像一株草一朵花一样，没心没肺。

“明朝时，国师刘伯温曾向朱元璋讨得一道圣旨，龙、庆、景三地菇民才得以在全国各地做香菇。”

我父亲说这话时，已经不做香菇了。他彻底告别做了一辈子香菇的江西，回到只剩几个老人的龙井。跟龙井这个村庄一样，父亲有过火热的青壮年时期。他十六岁跟祖父出门做香菇，曾代表龙南乡参加市里召开的菇民代表大会。那是1984年8月，我们姐妹仨头碰头凑在一起，在那张灰扑扑的大合影里找到了父亲清俊硬朗的面庞。这张合影当时被装进我们家相框，一直挂在我们家堂屋墙壁上。现在则已归入我个人的影集中。每次有人问起我的出身，我就会微笑着告诉他：我出身香菇世家。

回到龙井的父亲还忧虑着香菇砍花法技艺的失传，时时念叨。另一边，他开田辟地，广泛种植，像是要恢复龙井生机勃勃的往昔。我常常在节假日从龙泉县城开车回龙井小住，赶在清晨露水未干时，去屋旁玉米地里摘几棒玉米当早餐；搬柴火烧好土灶，选几样父亲刚摘的蔬菜清炒。这时候，我的父亲还健康着。

2018年深冬，父亲去世。龙井的家门彻底关上。

这之前，我已经开始写龙井。我没有能力达成父亲夙愿，改变一门技艺凋零的现状。我也接受历史进程中的一切改变。但我可以记录，浙西南深山里有一个叫龙井的小村庄，香菇发展的历史星空里有它点燃的一束光芒。

父亲死后大约两年，我重新坐回电脑前，继续在文字里回到龙井。书写的日子，我是多么快乐，常独个儿笑出声来。

我庆幸自己还拥有文字，感恩命运赐予我一座温暖的村庄。我相信，我的记录才刚刚开始；而且，此生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。

散文集《小村庄》，吴梅英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。

吴梅英，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光明日报》《大家》《西湖》《延河》《草原》《诗探索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浙江散文》等报刊。

高上兴，浙江丽水人。鲁迅文学院第34届高研班学员、浙江省作协会员。作品见于《青年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西部》《文艺报》《黄河》《西湖》等报刊。

远的村子，有自己的方言，和龙泉话不大相同，这便给少年的“我”融入城市带来了局促。

乡音是农村人融入城市要去的第一道“疤痕”。如何对待这道“疤痕”？考验着作家。

在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品《宝水》里，主人公地青萍也有这样一段试图把自己从乡土里拉出来的经历。在读《宝水》时，我同时也在读《小村庄》，两边跳来跳去读，一会儿又跋涉于豫南的宝水村，一会儿又跋涉于浙西南的龙井村。虚虚实实、恍恍惚惚，感觉吴梅英就是地青萍。

乡土的强大拉力，总能以其独有温情和内在逻辑，重新把出走的少年揽入怀里。恩恩怨怨，得恩忘怨，乡土村庄是宽宽展展的，它不计较这些少年对自己的小小背叛。

当少年长大，当他们重新回家，乡土给予了他们最朴素的接纳。带着一点小小愧疚，站在壮年回望乡村、书写家乡，《小村庄》用了夕拾的笔调，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。

以成年的视角审视童年，以童年眼光打量世界，几乎也是朝花夕拾的标准范式了。但标准一致，也考验手艺。油盐少许、葱蒜若干，手力不同，味道各异。有的作品忆童年，手气重了，便显出陈旧味。手气轻了，便显油滑和轻浮。吴梅英的手气刚刚好。

在《动物之死》里，吴梅英小心翼翼地写了一系列的动物：叫白蹄的猫、叫三百五的牛、叫欢欢的狗，还有不小心被“我”踩死的小鸡，这些生灵陪伴着“我”成长，又不断带给我心灵的颤动。踩死小鸡的“这一瞬间成了我生命至痛的起点。它将幼年的我撕裂，让其中的一部分永远停留在那个春天的天井里，永远不会长大，一直颤抖不已”。

也许，正是这一种颤抖，这一种永远停留的部分，成为指引我“回家”的灯火和星光。

小说。多种文体的训练，使她得以自由地在文字间呼吸。通读完《小村庄》，不难发现，在这些散文里，她实际上建构了一批形象。

且看一例。写母亲，这是难度很大的命题。滥俗、虚情、卖惨，等等，一个又一个陷阱摆在写作者的面前。吴梅英写《我的母亲》，也写母亲之死。这本是很沉痛的事，但吴梅英却忽然荡开一笔，将母亲生前的搞笑往事，夹在了母亲之死里。母亲上山砍柴，记错了柴放置之处，认为是别人把自己的柴偷走，也偷偷将“别人”的柴背回来，还“对我们姐妹眨眨眼，鬼鬼地笑着”。被父亲说她背的那捆柴就是自己的柴，母亲还不服气，硬说自己的柴更大捆。

母亲那狡黠、嘴硬的形象，瞬间就生动了起来。两相映照，生的欢乐，死的悲伤，交织共鸣，让人落泪。

此外，还有对自我形象的建构。当我们把《小村庄》里那些散落在字里行间的“我”捡拾、拼凑起来时，一些有趣的画面就出现了。“我大哭，却还不肯撤退。我躺了下来，躺到那冰冷的泥地上，不断蹭着一双腿”（《年味》）；“坐在厨房漆黑的地面上，仰头声声哭喊”（《雪落了一地》）；“我的家人烦我老张着嘴巴哭，给我取了外号‘水岸’”（《老屋》）。写上学的茫然：“我们以为抄写就是作业本身”，“每天本子发下来，一个大红X，我们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，然后默默盖上本子”（《六一》）。

类似的描述，如果不嫌麻烦，还可以再继续罗列一些。当我们把这些罗列出来，再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下，恐怕可以把“我”画得八九不离十。这实际上也是作者重新建构了一个自我的童年形象。

“我”是吴梅英吗？不知道。“唯有共同的村庄，像一个水潭，容我们回返，短暂停留，又笑着再次出发。”

一

吴梅英的龙井，位于丽水市龙泉市南部，与丽水市景宁、庆元两县交界。龙泉以青瓷、宝剑而闻名于世，龙井村却跟这两项技艺不沾边。它另有独门技艺：在过去，这里的村民以种菇为业，男人们冬天出门、春天回村，过着一种候鸟式的生活。

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，构成了龙井村独特的文化背景，带来了独特的精神气质。吴梅英的散文，很准确地抓住了这种独特性，并将它呈现出来。在《拾榧及其他》中，吴梅英抓住了“接饼”这一独特习俗，写出了菇民平安回家后的欢乐和热烈。在菇民区，出远门的人，到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带回来的饼分给左邻右舍。饼分大饼小饼，大饼由大人挨家挨户送出，小饼由孩子们上门接走。在接饼的习俗里，“我自然是这条河流的中心，被全村兴奋的浪潮抛起在最高点”“当了主角的自豪感充盈着我的心田”。

然而，在这份欢乐和热烈的背后，还有被吴梅英隐藏掉的忧伤。稍稍了解香菇栽培史的人，都不难自己补上这隐藏在欢乐海洋底下的冰山。这座冰山是龙泉、庆元、景宁三县菇民艰辛的创业史。过去，三县菇民常常远赴江西、福建、安徽伐山种菇。

当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，再读到“吃了这家等下家，整个春天，龙井的孩子就这样等着爸爸们归来”时，那欢乐背后的一抹淡淡忧伤，便随之而出了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以往的、不多见的以香菇为题材的作品里，作者通常对外的男人着墨较多，而对在家的妇女、老人和儿童，则较少涉及或虽有涉及却不够细腻生动。吴梅英以其女性的细腻温婉，书写出了留守人的静默与煎熬。

“冬天是荒季，龙井男人都出门去了，只剩下老人、女人和小孩，在冷风里煎熬，饭桌前静默相对”（《雪落了一地》）；“没有男人的老屋，夜晚显得格外幽深黑暗。……我们每晚都睡得很早，大人小孩全挤在一个房间，大家一进房间就赶紧闭上房门”（《老屋》）……这样的一些书写，应该说较好地补充了香菇题材的空白。

当然，在《小村庄》里，这样的笔墨只是露出了一鳞半爪。相信吴梅英在今后的写作里，还会有更多的拓展和深化。

二

再说回到龙井村。这个偏

三

吴梅英写散文，也写诗歌和